

老北京杂吧地

天桥的记忆
与诠释

岳永逸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老北京杂吧地

天桥的记忆
与诠释

岳永逸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 / 岳永逸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5

ISBN 978-7-108-03582-0

I. ①老… II. ①岳…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北京市 IV. ①K89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7211 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2

字 数 410 千字 图片 60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目 录

绪论 你说的与我写的：杂吧地天桥的叙事 1

- 一、北京城：大写的“凸”字 3
- 二、作为北京象征与焦点的天桥 8
- 三、新瓶陈酒：“人民首都”的天桥 17
- 四、养穷人：对话交流中的天桥 23
- 五、想象杂吧地：我写的天桥 29
- 六、俯仰易位：杂吧地天桥的北京 34

上编 养穷人：口述的天桥 39

- 一、落到天桥，你就不值钱了
——李长荣访谈录 40
- 二、在我看来，这是自然的事情
——玉庆文访谈录 55
- 三、茶馆的老东老伙
——冯建华访谈录 64
- 四、天桥的艺人都是混饭吃
——刘景岚访谈录 80
- 五、我就不说朱元璋，我就说范聘老祖
——王学智访谈录 92

六、天桥这地方，真养穷人

——朱国良访谈录 151

七、其实，学艺也不需要什么文化

——朱有成访谈录 178

八、我就觉得天桥有意思

——崔金生访谈录 186

九、我在天桥撂地，受双重压迫

——金业勤访谈录 202

十、拜师拨眼，家传还是要投师

——朱赤访谈录 211

十一、除了艺术之外，我什么都不爱动脑子

——李嘉康访谈录 221

十二、同盟、联盟与口盟

——杜三宝访谈录 232

十三、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关学曾访谈录 247

十四、摔跤，一举一动都是文化

——马贵宝访谈录 260

下编 杂吧地：学术写作中的天桥 283

一、牵着鼻子走：无定法的田野

——天桥田野调查的回顾 284

二、城市生理学与杂吧地的“下体”特征

——以近代北京天桥为例 309

三、老天桥艺人的来源、认同与译写 356

四、生活、政治、商品及艺术：草根相声的知识考古 379

附 录 431

一、日本落语的传承与文化自觉

——桂歌助访谈录 433

二、眼泪与欢笑：唐代教坊艺人的生活 457

后 记 504



绪论

你说的与我写的：
杂吧地天桥的叙事

一、北京城：大写的“凸”字

何为北京人？吕方邑说：“就是这么一大堆人，圈在这么一个灰色的‘凸’字里，这就是‘北京人’。……我所说的‘北京人’，是被这灰色的‘凸’字圈住，出不去，也不想出去的人。”^[1]李健吾也是用这个“灰色的凸”字来描述他眼中的北平城的：

北平的城像一个凸字，也像一辆装甲车。平剧梅龙镇里面，明朝的正德皇帝用一个比喻说到他的住所，大意是：大圈圈套着一个小圈圈，小圈圈又套着一个小圈圈。所谓大圈圈，就是北平的外城，凸字的下半截；所谓小圈圈，就是北平的内城，凸字的上半截，城虽说分做内外，并不是圈圈，也并没有谁圈着谁。只有那个小而又小的圈圈，的确套在内城的中心，通常另有一个尊贵的名称，叫做紫禁城。^[2]

因为有皇帝的关系，“凸”字的上半截、环绕上半截的城门和城墙、小圈圈中的小圈圈也就一直为人们关注、想象、书写和阅读。带着他者的新奇和敏感，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曾经深情地将城门比作古老京城的“口腔”，并且是他探知北京这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的生命和活动的节奏”的入口与通道。^[3]迈尔则更鲜明地指出，不是别的，城墙才是帝都北京以及传统中国的“真正本质”（real essence）。^[4]曾在内宫伺候过两年慈禧的德菱出宫后，也曾作为见证者和代言人迫不及待地向西方人宣讲内宫秘密。^[5]同样在民国初年，有法国马可·波罗之称

[1] 吕方邑，《接壁儿老太太言》，收入陶亢德编《北平一顾》，上海：宇宙风社，1939，页27。

[2] 李健吾，《切梦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页41。西方人也曾用凸字来描绘京城的形状，参阅 Nigel Cameron & Brian Brake, *Peking: A Tale of Three Ci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p.42。

[3] Osvald Sirén,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London: Lane, 1924, p.130.

[4] Jeffrey F. Meyer, *The Dragons of Tiananmen: Beijing as a Sacred City*,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p.4.

[5] Der Ling (德菱),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31. 就在该书内销到国内后，多年在清廷做官的夏仁虎曾指出其“语多非实”的虚妄以及背后的目的，可参阅[明]史玄《旧京遗事》，[清]夏仁虎《旧京琐记》，[清]阙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页61—62。

的谢阁兰也发挥了他丰富的想象力，与他的主人公勒内·莱斯一道，游刃有余地出入前门内外，在紫禁城中做起了密探、情人。^[6]这种基于敬意、理解而有的窥私、探秘，并不无妒忌和泄愤的潜在的创作美学和接受美学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也是国人自身的。当下，收视率极高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大帝》等清官戏的盛行除不得已的“借古讽今”以满足人们评价现实的胃口之外，吸引观者的还是一直都神秘莫测的那个“小圈圈”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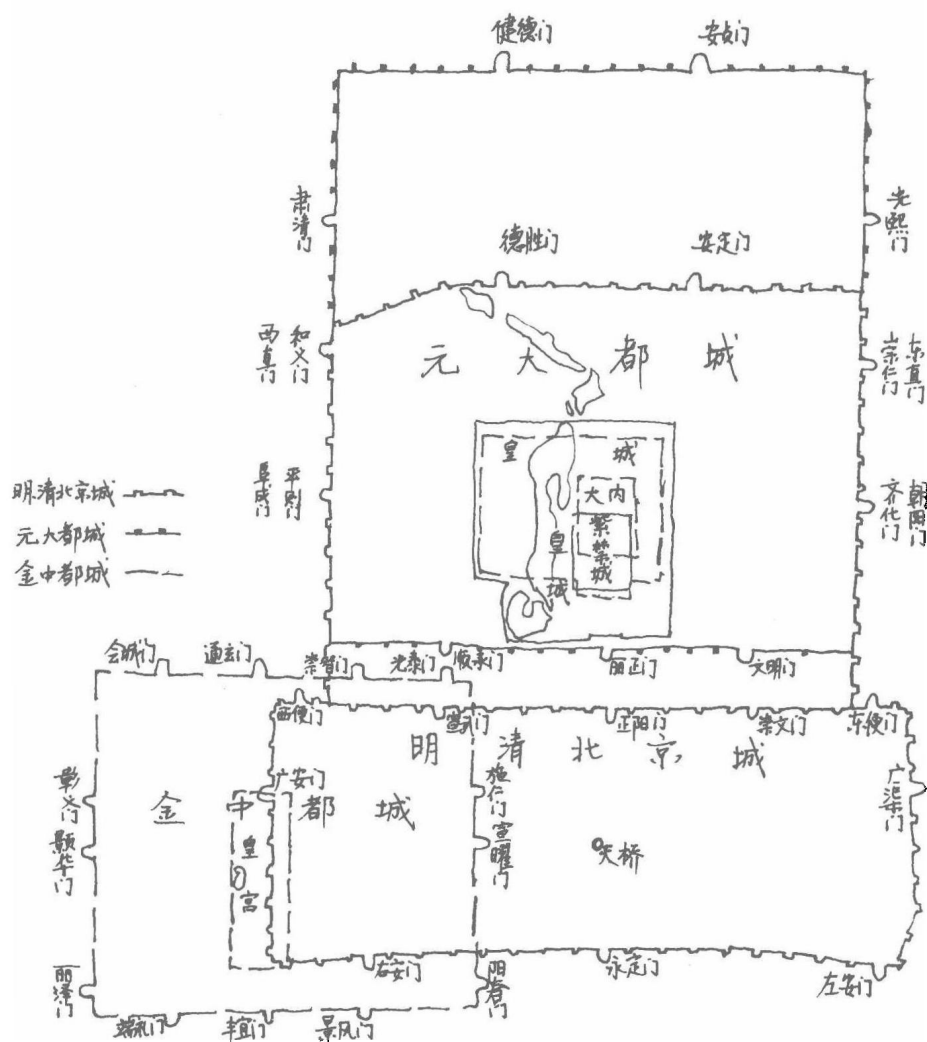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作为新中国象征的天安门取缔了小圈圈，成为学界新宠，不同学科的学者都给予了关注，试图将之视为“一种概念性的入口，藉以踏进中国的漫长革命”。^[7]对于影响颇大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一书，陈平原感觉上“不是很过瘾”。他认为该书只讨论康有为、鲁迅、丁玲等人的作品，借以剖析其心路历程，而没将阅尽人间沧桑，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和历史的象征的天安门“作为主角来认真经营”。对陈平原而言，完美的天安门的研究，应该是融“都市建筑、历史陈述、政治符码、文学想像”等一体的综合论述。^[8]

确实，既是新中国象征也是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市近代化象征的“天安门”一直是人们解读的主要意象，但也正因为天安门本身有太多“政治和历史”的象征意义，专注于它的解读也仍然会不自觉地停留在精英和“大历史”层面。反其道而行之，我抛弃了天安门，要描述和研究的是老北京的杂吧地天桥，北京城这个

[6] 谢阁兰，《勒内·莱斯》，梅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其实关于紫禁城的写作很多很多，一直都在持续，如 Reginald F. Johns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Frank Dor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Biography of a Palace*, New York: Scribners, 1970;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Forbidden City*, New York: Newsweek, 1972; May Holdsworth, *The Forbidden City*,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The Great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温治溢译，台北：时报文化，2007，页 14。另外可参阅敬文东《从铁屋子到天安门：关于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空间主题”的札记》，《上海文学》2004 年第 8 期，页 68—82；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8] 陈平原，《“五方杂处”说北京》，收入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 533—534。



金中都、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示意图。



昔日的天桥这座桥所在的位置。

“凸字的下半截”正中间的一部分。杂吧地天桥位于京城南北中轴线，在天安门
的南边，前门外永定门内。清末以来至 20 世纪中叶，这里是一个三教九流云集、
在精英阶层看来脏、邪、乱的地方。

关于这个大写的凸字的下半截，在与紫禁城进行比较时，谢阁兰这样写道：

如果你不观看它，而是住在它里面，那它则是一幅令人难忘的图景。一
座置于矩形之上的方城。这矩形，也就是唯一的底座，尚未完成时，已经被
弄得走了形；它的右城墙，它的东城墙被弄得歪歪扭扭，断断续续。^[9]

[9] 谢阁兰，《勒内·莱斯》，梅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页 113。

于是，进不了紫禁城并只能在前门附近游荡的“拾荒者”谢阁兰，既没有加入到“这种麇集在粪堆之上的蠕虫的‘一致’而又肮脏的”凸字下半截的生活之中，也没有加入到“那些寄生的绦虫的”凸字上半截的生活之中，而是“平行地，极端冷静而又谨慎地生活着”。^[10] 确如谢阁兰的粪堆、蠕虫、肮脏等意象，从外在景观、生活人群和文化归属等层面而言，外城的杂吧地天桥与内城的天安门都大相径庭。也与谢阁兰表现得极端冷静和谨慎实则是对紫禁城的臆想不同，对我而言，与轰轰烈烈、繁花似锦的天安门一样，杂吧地天桥同样是北京的象征和焦点。

早在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卷三“地部一”中就勾画出了北京杂、乱、丑的面相：

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狙佻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11]

在编辑出版自己1933—1946年拍摄的老北京精美的照片时，赫达·莫里逊同样盛赞繁华帝京生活的“阴暗”面：

在迷人的北平和能够感受到的快乐生活的背后，却是沉重的困难与触目惊心的贫困。乞丐并非贫穷的真实写照，因为许多乞丐是专门组织起来行乞的。正是那些不要饭的人才真正反映出最极端的贫穷。无论是捡废纸破布还是在夏天为养鸟的人捉蚱蜢，这些谋生手段常常为人们忽视。冬天，不少人倒卧，冻死街头。最了不起的是那些忍受着巨大苦难却从不抱怨，依然快乐

[10] 谢阁兰，《勒内·莱斯》，梅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页49。

[11] 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潘膺祉如韦馆刻本，万历四十四年，页九上、下。

坚毅的人们。^[12]

林语堂也曾说，“北平最大的动人处是平民。决不是圣哲的学者或大学教授，而是拉洋车的苦力。”^[13]而诸如骆驼祥子那样拉洋车的苦力，在京城忍受着巨大苦难而仍然坚毅地活着，半数原因就在于这“凸”字下半截的杂吧地天桥：

平日，这里的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唱秧歌的，说鼓书的，练把式的，都能供给他一些真的快乐，使他张开大嘴去笑。他舍不得北平，天桥算是一半儿的原因。每逢望到天桥的席棚，与那一圈一圈儿的人，他便想起许多可笑可爱的事。^[14]

二、作为北京象征与焦点的天桥

因为城墙和狭窄的街道阻碍了近代商业社会所需要的人与货物的自由流动，所以象征中国人宇宙观和帝国秩序的城墙环绕的传统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历程，是以“拆除城墙为开端的”。^[15]在此进程中，为工商业服务的经济逻辑取代了保卫行政中心安全的防卫逻辑，城市空间被重新经营配置。20 世纪的前三十年，甚或更早，北京城就在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开始了效仿西方都市的近代化历程。与排污系统、供水系统、电灯照明、铁路、电车等城市交通的改造一道，社稷坛、天坛、先农坛、太庙、颐和园等皇家的花园、祭坛成

[12] Hedda Merrison,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7.

[13]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收入《语堂杂感集》，香港汇通书店，1963，页 22—29。

[14] 老舍，《骆驼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页 135。

[15] 周锡瑞，《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收入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 21—22 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页 2—3。

为公园。^[16]作为北京城开始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部分,铁路站和有轨电车车站在天桥附近的修建、民国初年政府在天桥南侧的香厂模范区的建设等,使前门外天桥的公共市场和娱乐业在清末民初迅猛发展起来。^[17]换言之,这座横跨东西龙须沟、南北走向并一度仅仅是祭天和祭农时皇帝才能通行的石拱桥——天桥,演变成“传统”平民娱乐地名的天桥^[18],是“新兴的”,是随着北京城在列强外在威逼和民族内在求生存发展交互作用下的近代化历程中发展兴旺起来的。作为老——旧北京的象征之一,作为显露人生众相、观念变化和都市发展的标志,天桥也是有着“眼光向下”意识的人们关注并书写的对象。

乾嘉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在相当意义上,诗人笔下的天桥是作为与城市生活相对的乡村而出现的,一片江南风光。夹在天坛和先农坛之间的天桥是游玩地、饮酒地与送别地,是文人雅士消愁觅恨、焕发灵感,也表达着闲暇安逸和生活乐趣的地方。黄景仁在此醉酒,张问陶来这里踏青,孙尔准不仅在小寒时节踏青至天桥小饮,还在十月的望夜到天桥玩月,洪亮吉则在此

[16] 北京城市空间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在促进基础设施变革中的作用、变革对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活的影响等一直都是史明正北京研究的关注点。他认为这些使城市市民化、现代化并意味着效率的举措,不仅改变了北京城旧有的象征皇权、威严和社会等级的城门、城墙、宫殿环环相套的大小圆圈的风貌,还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近代化等转型,而这一转型时间上的起点是义和团运动和随后清政府实施的“新政”。参阅史明正著《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王业龙、周卫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 *Modern China*, 24.3(1998.7), pp.219-254;《清末民初北京城市空间演变之解读》,收入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1—22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页434—441。另外可参阅王均,《近代北京城内部空间结构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与本土学者力图梳理清楚北京城现代化历程的宿求稍异,西方学者已经提出了新中国的北京城又在营造新的神圣化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命题,以及北京作为圣城(sacred city)的内在性和延续性,分别参阅 Marwyn S. Samuels & Carmencita Samuels, *Beijing and the Power of Place in Modern China*, in John A. Agnew and James S. Duncan ed., *The Power of Place: Bringing Together Geographical and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202-227; Jeffrey F. Meyer, *The Dragons of Tiananmen: Beijing as a Sacred City*,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17] 参阅 Madeleine Dong Yue (董玥), *Republic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1911-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173-183; 本书下编“城市生理学”与杂吧地的“下体”特征·日渐繁荣的天桥”一节。

[18] 岳永逸,《当代北京民众话语中的天桥》,《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页54—67。

“送君约君”。^[19]

诗作中妩媚迤邐的天桥差不多延续到道光年间。至清末民初，天桥已经是人潮涌动，艺人群集。关于天桥的浅吟低唱也就多了些人间的烟火气息，多了对艺人表演的描述，也多了苦难，但不少仍然是浪漫的与古典的，尤其是对艺人演技的赞誉。如：描述说书的“道旁有客说书忙，独脚支棚矮几张，白叟黄童齐坐听，乞儿争进手中香”。说四趺子“趺腿何曾是废人，练成杠子更通神。寒鸭浮水头朝下，遍体功夫在上身”。说百鸟张“学来禽语韵低昂，都下传呼百鸟张。最是柳阴酣醉后，一声婉转听莺簧”。说双簧“由来杂耍演双簧，徐狗从前独擅场。博得满堂开口笑，挤眉簸脑应声忙”。^[20]这种风格的吟唱一直延续到民初，如：“正阳迤邐到天桥，剧座书场处处招。漫道平民娱乐地，个中粉黛也销魂。”“金鱼池畔柳依依，春满天桥透紫薇。车马如梭人如鲫，坛墙作壁松作帷。歌声响澈珠砂痣，戏法巧脱仙人衣。热闹场中兼斗笑，解颐还是云里飞。”吟咏大兵黄的“市人环顾立中央，吐气扬眉道姓黄，热骂冷嘲无忌惮，却原兜售纸包糖”；“骂不绝声立广场，群皆属目大兵黄。官僚军阀从头数，博得游人笑断肠”。说大金牙“钹鼓冬呛静不哗，西洋美景客争夸。唉声怪气愁眉脸，人人喜听大金牙”。^[21]

考虑到那时的仁人志士正在效法西方，考虑到清王朝正不可避免地走上末路，考虑到这些原本欲效忠朝廷、科举制度培育下的文人奋斗之路被阻，面临着精神上的断奶和阵痛，我们不难理解这些在天桥街头目睹艺人表演的文人，对命运陷于窘境的艺人演技吟唱的隐喻意义。换句话说，在这些吟唱展示出来的街头艺人演技与动荡中的帝都市民生活一角的背后，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失意文人的身影与顾影自怜的哀伤。于是，也就有了“士女不知亡国事，倾城车马下天桥”的绝望式的享乐。

主要以姜德明编的《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和《如

[19] 这些诗人关于天桥的诗作，张次溪进行了梳理和摘录，参阅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北京：修绠堂书店，1951，页27—33。

[20] 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页218、229、429。

[21] 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页252、191、90、209。

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两本散文集中诸多篇章为例，董玥分析指出，民国时期，“不是人群中的诗人”，“甚至根本就不在人群中”的“新知识分子”的“我的北京”，是“建基在他们与其他市民的距离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靠这座城市普遍的贫困支撑的”。与这些“新知识分子”不同，关注并描写天桥的新知识分子注意的正是支撑北京这座城市的“普遍的贫困”。老舍就是“在天桥街头涌动的百姓人潮中看这座城市的”，并用他“笔下鲜活的人物，为收藏家在五花八门的再版明清史籍、方志以及风土人情百科中捕捉到的静止、凝固的旧京注入了活力”。^[22]

在小说《啼笑因缘》中，张恨水不但将天桥与什刹海、西山相提并论，与那个年代刚对市民开放不久的公园先农坛、北海等文化北京的标志性旅游景观并置，而且还以天桥为故事发生的基本场景。^[23] 沈凤喜、关秀姑这些在天桥卖艺讨生活的人都是故事中的主角，这些生活在天桥的俗人“价值虽然有点儿功利实际，但人情却醇美深厚”。相反，混迹于天桥的樊家树等人，虽然出身上流社会，却多能鄙事，与练把式的关老爷子平起平坐，谦逊恭俭。也即，在张恨水这里，俗雅之人的界限是模糊的，俗雅之人寄身的凸字上半截与下半截的界限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模糊的。作为张恨水表达自己对生活理解的一个意象，天桥也就有了无穷的意味。也正因为《啼笑因缘》的影响，直到20世纪末，还有游客前往天桥寻找早已经没有的水心亭。^[24]

与老舍人潮涌动也不乏欢快的天桥不同，也与张恨水明晰而朦胧的天桥不同，钱歌川笔下的天桥更多了几分实感、愤怒，直呼天桥是“贫民窟”。在《游牧遗风》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天桥也就和伦敦的东区（East End）一样，是北平的贫民窟。这儿的人

[22] Madeleine Dong Yue, *Republic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1911-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266-295；《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收入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39—268。

[23] 张恨水，《啼笑因缘》，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24] 成善卿，《天桥史话·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页1。